



新安沉船与福建陶瓷



李榕青 (福建博物院博物馆之友)

自20世纪70年代在朝鲜半岛西南部新安海域发现一艘中国元代沉船,至今已经是第三十三个年头了。

这艘来自中国的元代商贸船,被认同是1323年6月从宁波港启航。已经打捞出水的中国遗物有青瓷系、青白瓷系、白瓷系、黑釉系、钧釉系的瓷器及杂釉器、陶器等20661件;另有东亚、东南亚国家共同喜爱的青铜器、银器、金属器,可供交易用的铜钱,囊括了王莽、后汉、唐宋以来各朝代的品种,年代自公元14~1310年,还有木器、漆器、石器、骨制品、玉制品、东南亚的木料、香料、药材等。甚至还发现琉璃器与中国特色的赌具“骰子”,可谓“货物丰溢”。

据韩国方面提供有关沉船货物装载的分区、出水形态不一的墨书木牌(写着货主的日本名与画押、僧侣名、寺院名、货物件数、装船日期等等)、沉船七个区发现的日本制品(有濑户梅瓶、双鹤文镜、漆画朱漆杯、将棋、刀柄等,有可能是货主各自守仓时用的随身物品)、装运胡椒和瓷器的木箱有反复使用过的痕迹(尽管尺寸大小不一,形状与材质却是一样)等资料,这条元代中国船有可能是为日本多家雇主承载商品、同时也供客人搭乘的远洋货船。贸易货船的货主有可能为日本镰仓末期(1185~1333年)代表幕府的寺院代理人、主事人、僧侣及民间商人,而作为被雇佣的船主与水手以及乘客应是不记名的。

北宋末以前,日本的皇室、贵族拒绝向中国臣服,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但中国民间商船带来的香料、丝织品、方苏(一种红色染料)、茶碗、书籍(包括佛经)、文具等,无不受到日本皇室、贵族的青睐,成为其宫苑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日本平安时代(794~1191年)后期,大权在握的武家平氏集团的平清盛(1118-1181年)热衷中日贸易,为南宋商船的到来修建大轮田泊港(即现在的神户港),开凿、整治了音户水道,并建造了

福原离宫,专事监理贸易活动,并于1174年将南宋新版的《太平御览》献给高仓天皇,还安排退位的后白河法皇(1127~1192年)在福原离宫接见南宋商人。根据成书于13世纪的《平家物语》描述,平氏家中的众多宝物无不来自中国。日本学者森达也介绍,在这个时期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器是以广东潮州窑、福建闽江流域的白瓷、景德镇窑产的青白瓷、白瓷为主的。

镰仓时期(1185~1333年)、室町时代初期(1333~1568年),日本武士已经成为新的权势阶层,他们不仅追逐“唐物”的品种和数量以显摆尊贵、流行通过酒宴茶会炫耀文化修养的“唐风”,还努力将从中国引进的禅宗作为武士的必修。有资料记载:

1325年实权派的北条氏为筹建镰仓建长寺的费用而派船一艘;

1332年为筹集京都住吉神社的费用派船一艘;

1367年医师道直为修疗养院向幕府准请派船一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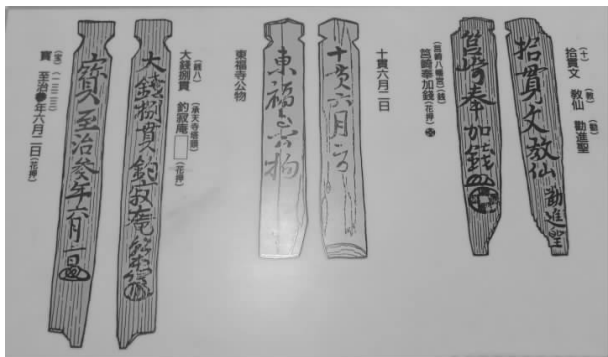
1342年,亲政的足利尊氏借口梦见已故的后醍醐天皇,为慰藉亡灵要筹建京都天龙寺,也派船一艘,载回一批精美的龙泉窑青瓷,被认为是最高级别的“唐物”,后人称之为“天龙寺青瓷”。

木宫泰彦先生在《日元间商船往来一览表》里尽可能列举商船往来的频繁记录,说日本驶往元朝的商船除了天龙寺船外,其余都是私人的船。由此可见,元时的日本一反以往以宋商为主导的宋日贸易,已经能够主动把握“买卖得利百倍”的贸易权,并以此促使中国式的禅院在日本镰仓、京都等权力重地和港口应运而生。

在此期间,迫切寻求“唐物”的日商、日僧来华的年均人数几乎是南宋时期的四倍,不少中国商人获利只需守株待兔;加上元政府两次对日战争,增加中国商人赴日贸易的风险,因此元代中国商船到

日本的数量较宋时期相对减少,而同时期的日本却创下1279年入元四艘商船、载有两千余日本人的记录。1277年至1365年,名入史册的入元僧达二百二十余人,不记名的更不知有多少人,他们来往都是搭乘商船,这也反映了元代日本单向贸易的特征。当时中国的造船、航海水平领衔世界,不排除日商、日僧喜爱搭乘先进的中国商船,雇佣航海技术高超的中国水手运输商品的可能。而新安沉船的遇难也正处于这个繁荣时期。

新安沉船出水了364只木牌,按身份分类有20个日本货主或代理人,写着至少有13个僧侣名,职务名“纲司”的木牌全写着“私”字的多达110只;至今有案可查的名“东福寺”的木牌,都标着“公用”或者“公物”的有41只(东福寺,建于1236年,是京都最大的临济宗禅寺);其他还有“寂寂庵”(建于1242年,为博多承天寺的塔头)、笠崎宫(创建于921年,是福岡市八幡神社)等,显然是公私兼有的贸易合作关系。沉船木牌写着寺院僧人、半官半私的商贸人、民间商人的名字与画押等,也反映了当时日本幕府奉行开放政策、海外贸易迎合国内对“唐物”的需求与投入(图一)。



图一 日本福岡市立博物馆陈列

这艘不知名的元代中国商船满载着贸易货物,也承载着日本商家、权贵与寺院僧侣们的梦想去远航。当它沿着韩国全罗南道木浦新安海岸航行时却不幸沉没了。是暗礁还是风暴使之沉寂在异国海底将近七个世纪,海浪吞噬了航海者与搭船人的生命和财富,海流、海洋生物分解、侵蚀了船体,沉积物、泥沙却有可能覆盖、保护了沉没的遗迹和遗物……。但是究竟还能重现多少信息给后人呢?

据韩国方面提供的沉船资料,出水的元代沉船与浙江船样完全两样,与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在材质、尺寸、风格、装载量方面有着相似之处,特别是主龙骨和艏龙骨、以及艉龙骨的连

接处有保寿孔、都有象征“七星伴月”的铜镜和铜钱等。船舶专家介绍此乃福建地区信奉海神保佑船舶的典型特征。这说明当年的福建海船也活跃在从明州港出发到东亚的航线上。

位于福建闽江口福州怀安窑的青瓷早在唐代就从福州港输往日本筑前的博多,与浙江越窑系的青瓷共存于日本9世纪初至11世纪前半期的古遗址里,且在数量上居多。至宋元时期,更有众多窑址分布在闽江水系的两岸,其陶瓷产品靠顺流而下的闽江输送,一路向着东南出闽江口入海,北上或是南下直奔外销的海路。这一时期向日本输出了大量的白瓷、青瓷和黑釉器。新安沉船上发现的部分白瓷、酱黑釉器等福建陶瓷,恰恰也是闽江水系窑口的产品,同时又从沉船里发现了闽北地区特产的板栗、榛子残骸,还有荔枝核。北宋名臣蔡襄在《荔枝谱》里写到福建荔枝“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宋元时期福州地区沿江周边分布大量的荔枝园林,由于利润可观,“断林鬻之”,出口荔枝也有一定的规模。《梅溪后集》记载:“闽中荔枝三日至永嘉。”内销也十分便利。

出水的墨书木牌所用材质恰巧也为福建最常见的马尾松与杉木(有空白的木牌剩余,应是批量定制的)。且在贸易活跃的宋元期间,福建各港进口商品的纲运及福建物产也是由海路源源不断输往两浙的,许多福建船只频繁往返在闽浙两地的航线上。

从现已掌握的福建古代水运航线、沉船与古窑址、城市遗址的资料,新安沉船有可能是在福州港集散了从赣东北入闽江水系、自北而下的景德镇窑青白瓷(赣东北信江水系入闽江最便捷,绕道长江入宁波港则费时费工)以及闽江流域产的商品后(福建船不大可能空船出航),才前往明州的。因为根据元初“官本船”的制度,政府垄断海外贸易,元代市舶司管理方法承袭、超越宋代,对外商实行“封堵坐押”,外商返航需由市舶司官员公验、公凭和亲自检视。日商即便是初来也要履行抽分等手续方可上岸从事贸易活动。庆元(即今宁波)也一直是宋元以来发放前往高丽、日本贸易公凭的唯一合法港口。

由于目前还不曾从韩国已发布的沉船资料里发现有闽南晋江水系的瓷器或其他有闽南特色的商品,因此推测该船有可能在福州被日商雇用到庆

元港装载龙泉窑青瓷及内陆来的瓷器与其他各类商品,再经明州市舶司验货抽分和缴纳舶税后起航。那些一路相随的日本货主、僧侣、寺院的管理和乘客们,按中国东海气象的传统习惯,思想着乘中国沿海六月常刮的西南季风,顺利的话十天就可望到达博多。却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行至韩国新安海域就遇海难而终止了航程,默默无闻沉寂在异国的海床几百年,直至韩国渔民发现他们才重见天日。

就沉船里出水的福建陶瓷而言,其中有几十个建窑的黑釉盏,以束口、撇口的兔毫盏为主,有的碗口还讲究地做了铜、银的金属扣;多数碗底有使用过的划痕、口沿有破损,个个是旧物(图二),件件是



图二 新安沉船出水的带金属扣的(左)和有缺损的兔毫盏(右)。引自《唐物天目》

古董。这与爱茶、懂茶、嗜茶的宋徽宗早已客死边疆,建盏许久不再流行,建窑也已在南宋末期停烧黑釉盏,改烧青白瓷的史实相符。改朝换代后的元时期,国人茶风已变,散茶替代了需要碾、磨、搅拌后再点的饼茶、团茶,茶器也随之变换。而日本方面在这个时期已经有了大面积的茶园,保留了宋时代的制茶法,日本临济宗创始人、有“茶祖”之称的“叶上大师”荣西(1141~1216年)介绍的宋时点饮法由禅宗、律宗两大系统的推广得以普及;名僧南浦绍明(1235~1308年)25岁入宋,8年后辞别浙江径山寺回日本时,带回七部茶典和一整套点茶用具。他在回国的四十年中,先后在建长寺、崇福寺当过住持,仿照径山茶礼奉茶,对僧侣、贵族和武士们的影响是极深的。尤其是当时的权势们还刻意追求用宋朝皇帝与文人墨客诗书赞赏的建盏饮茶,寺院拥有的建盏成为皇室贵戚向往的珍品,饮茶引发的情调、乐趣和时尚在上层社会蔚然成风,使得日本的实力阶层竞相争购、使用和展示他们所

拥有的建盏。新安沉船里只有建盏被特意放在圆桶状的木盒里,显然货主是有意识将它们作为上品而珍藏的(图三)。日本研究建盏与茶道的学者由此认



图三 新安沉船出水的木盒
引自《唐物天目》

为,尽管建盏与饮茶法在十二世纪前半期就传到了日本,但是玩赏建盏之风始于十四世纪,十五世纪中叶发展到最盛时期。

日本各地出土建盏碎片的数量极少,质量上显然不是建盏中的名品,而历代得以保存的传世建盏多数为中国本土也不曾多见的精品。可见特别引进优质建盏本是日本古代皇室、大名等上层阶级喜好茶文化的初衷。他们通过特别的渠道获取或是高价购买,使之作为用于装饰、赏玩、礼仪的茶道具,精心保存了中国与多数国家都不曾收藏的建盏极品(图四),最终作为大名家中的高级艺术品流传后世。这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情。

据说新安沉船还有发现后来的桃山时代(1573~1603年)日本茶道时尚使用的“灰被天目”茶碗。由于



四 兔毫盏
现藏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

不见图片及实物,无法断定。但沉船里有200多个簇新的浅腹黑釉茶盏,器形为敞口和撇口、圆饼足,釉色为黑色、酱黑色、褐色、酱褐色,有的碗底聚釉成珠三四点,有的碗沿不周正;海水的浸泡并没有使之黯然失色,对比端庄、精致的建盏而言,它们几乎个个质朴古拙(图五)。这些新面孔的浅腹茶盏,在沉船被发现的二十年后,藉由福建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南平茶洋窑时,发现它们出自该窑的安后山元



图五 新安沉船浅腹黑釉盏（引自《唐物天目》）

代窑址。从考古发掘情况判断,同一座窑炉还生产过被日本恬静茶道奉为至尊的“灰被天目”茶碗。这些品相、质地、釉色、工艺逊色于建盏的仿建盏,因为碗底较建盏更阔,更适宜竹筴搅拌抹茶,可能因此成为1320年前后日本濑户一带的陶业最先模仿的茶盏器形。在难以获得名贵建盏的年代里,受茶道开山之祖村田珠光(1423~1502年)的引领,“灰被天目”茶碗一度成为脱离了属于贵族的高雅书院茶走向平民化茶道的新宠,以致于在“侘数寄”(wabi-suki)茶道流行的桃山时代曾经取代过建盏的“将军”地位(图六)。



图六 日本传世的“灰被天目”茶碗

(左)秋叶天目、(右)珠光天目(引自《唐物天目》)

南平茶洋窑考古发掘简报表明,闽江北岸的茶洋窑群,从北宋至元代一直使用长达70余米

的龙窑或分室龙窑(图七)。烧造青瓷、青白瓷、黑(酱)釉瓷、绿釉瓷,其产品除了日常生活用器,与饮茶相关的壶、瓶、水注、茶盏的数量也很可观,并



图七 福建南平茶洋窑大岭干宋代窑址的窑炉遗迹

频频发现于日本的古遗址。出现在新安沉船里的成批黑釉浅腹茶盏,有可能是元代茶洋窑工并不知道日本依然崇拜建盏式的茶碗,所以随大流停烧了中国不再流行的深腹仿建盏,改烧大批浅腹的小茶盏。有意识选择黑釉茶盏的日商和日僧在收集不到更多数量的建盏、仿建盏之后,只能将就购买新产品,且价格低廉、可供众僧使用,贩卖也有利可图。恰在日本镰仓建长寺的玉云庵遗址里,也发现了茶洋窑的浅腹茶盏,盏底有“玉云”的墨书,说明当时是寺院购买、使用的(图八:玉云庵碗)。

1998年,福建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在福州市区的多处宋元古遗址中发现为数不少的细泥胎质、施酱釉、高温烧制的陶器。福州地区的宋元时期墓葬、宋代福清东张少林寺院遗址也有出土同类陶器。因为这批陶器胎体轻薄、质地坚硬,无论器形大小,器壁厚度多在1~2毫米,故取名为“薄胎酱釉器”。已经发现的薄胎酱釉器有小罐、执壶、水浇、急须、水注、水盂、钵、灯盏、香薰等,其中小罐的器形最为多样。由于在城市、寺院遗址出土时,小罐与同时期流行的茶器在一起,考古人员推断此类小罐与茶事有关,应是当时装贮末茶的茶罐。有的墓葬遗留小罐内还有茶末(图九)。这也反映当时福建饮茶普及,官衙寺院、寻常人家都少不了点茶啜饮,小巧的薄



图八 日本镰仓建长寺玉云庵遗址出土的福建茶窑浅腹黑釉盏
(引自《The Sinan Wreck and Ceramic Trandes in East Asia》,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2006)



图九 福州城市遗址出土的薄胎酱釉器
(引自《福州出土文物精粹》)

胎酱釉罐作为本地人家讲究的茶器来使用。

经过福建考古人员对福州周边地区的调查,发现宋元时期福州洪塘窑遗址遗物的器类、生产工艺与城市、寺院、墓葬遗址出土的薄胎酱釉器是相同的,与日本古代保存至今的各式小罐类同,也与新安沉船出水的“黑褐釉小壶”相似。原来研究日本茶道具的学者们梦寐以求“茶入”的产地是在福建。福州私人收藏品中就有与日本传世品相同、相似的多种小罐,也有日本不曾有的样式,据日本研究人员以往提供的新安沉船资料,只是提到沉船出水的中国小壶内放着丁香,也是日本茶道重要的茶道具,用于盛放抹茶粉,被称为“唐物茶入”。由于在1999年之前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方面,都不知道小罐的来源出处,也没有发表具体的出水数量,因此无法认定此类陶器是批量外销还是船主自用自备。直至2006年韩国方面发表了按照釉色将其分为A、B、C三类,数量多达225个。被日本茶道命名为“大海”型的小罐占217个,命名为“丸壶”型的小罐只有8个(图一〇)。其中还有24个江西赣州窑产的黑釉鼓钉罐,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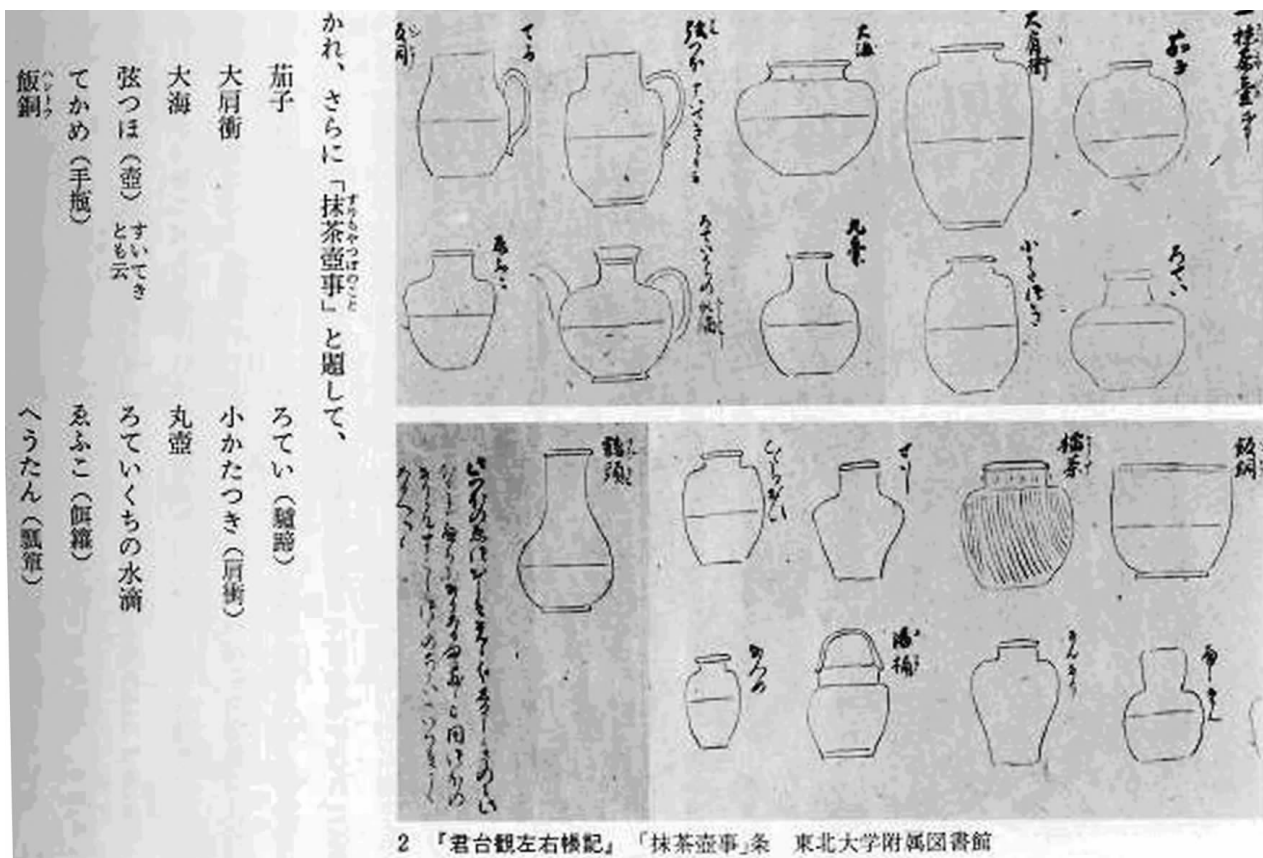
内满釉,也是作为茶器购入的。

在13至14世纪前半期的日本贸易港与城市遗址都有不少的“唐物茶入”的碎片出土。说明福州最早向日本输入薄胎酱釉小罐时还只是作为民间普通使用的器皿。在饮茶风已经盛行的1343年的日本文献《祇园执行日记》里,除了记载着买了廉价的“天目”外,还写着买了两个小茶罐、定制两个小口袋的花费。“唐物茶入”在日本的存在与日本文献的记载,证实了福州洪塘窑除了生产本地消费的陶器,还凭借海路之便提供产品外销。日本研究“茶入”的学者认为13、14世纪的日本以输入“大海”型的“茶入”为主,福州与日本多处古遗址、新安沉船里恰恰也是多数出土此类薄胎酱釉小罐。在15世纪的日本文献《君台观左右帐记》中,足利义政将军(1436~1490年)的文化侍从在“抹茶壶事”条里画着19个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冠有名字的中国小茶罐,其中也包括一个器颈部装饰鼓钉纹的“擂茶”(图一一)。日本历史上的许多著名茶人(包括千利休)的遗作里多画有不同形态的“唐物茶入”,并著文对之仔细描述、倍加赞赏。日本根津美术馆于2005年出版《唐物茶入》一书,将全日本各博物馆、美术馆、文库、财团、寺院收藏的“唐物茶入”分为十六类,数量多达几百个,汇编成图录,“茶入”大部分冠有名人的姓氏。还有的因其品相沉稳持重、流釉自然天成而获得诗意妙趣的别名。据日本研究“茶入”的学者谷晃考证,福州出土的“大海”型“茶入”标本在胎土厚度、器形高度、口径、重量、制作工艺、施釉手法等均与日本的传世品完全一致。在洪塘窑遗址采集的手瓶、大小“肩冲”、水盂、水注、茶壶等完整品和残片也与日本传世品的线切割、板切工艺特质相同,和日本传世品的“肩冲”型“茶入”一样有口沿外翻、腹部有凹弦纹、流釉痕、指纹痕等等。(图一二)

考古人员对宋元时期名不见经传的洪塘民间



图一〇 新安沉船出水的薄胎酱釉器
(引自《新安船》,文化财厅,国立海洋遗物展馆,2006年)



2 『君台觀左右帳記』「抹茶壺事」条 東北大学附属図書館

图一— 日本《君台观左右帐记》“抹茶壺事”条

(引自林屋 晴三：《茶入賞翫》，《茶道聚錦》第十卷《茶の道具》(一)，花入・茶入・茶壺，株式会社小学馆 1986 年版)



图一二 日本传世的“唐物茶入”

(引自根津美术馆：《唐物茶入》)

陶窑的调查，证实此窑制作工艺是粗陶细作，使得其产品质地精细、胎体轻薄，高火硬质，且形态精巧、釉色宜人而成为“一种精制的、平时生活中常见但又不是大量使用的陶器”遗留在福建古代的居住遗址、寺庙废墟与官庶墓葬之中。福州洪塘窑的残存遗址、遗物为我们再现了消失近千年的茶具、茶韵和茶风。

9~11 世纪的福建海船，从福州港北上日本已有相对固定的海上航线。与闽江口为邻的洪塘窑产品在宋元时期通过海路将其特制特产的陶器销往

东亚，有幸成为日本茶道具中排名在建盏之前的“王者”（日本茶道是按照茶器与末茶距离的远近来排其名次的），在茶道具鉴赏的过程中担当重头戏。热爱“唐物茶入”的日本贵族、名人和大茶人把自己的姓氏和美好的诗意赋予小罐，并为之配备不同样式的精致象牙盖和不同面料、花色的高级“仕覆”（夹层的丝绸绣囊），在不同的茶会场合还要为小罐配置相应的牙盖和绣囊，如同王者出行准备的头冠和礼服；如果小罐有不寻常的名人档案，连续绣囊都属于价值不菲的“名物裂”（图一三）。在日本的战国时期（1467~1568 年），已经无处进口的“唐物茶入”代表着特权、战功和财富。如果是经才华横溢的风流大名、大茶人小堀远州（1579~1647 年）为“唐物茶入”取名题字，或是在盛放“茶入”的多层箱、黑漆盆里有小堀远州的隶书墨宝和雕铭，那意蕴就更加深远了。宋元时期福州生产的陶罐在古代日本因为名人故事、名人收藏，名人墨宝而使之文物价值倍增、流传至今成为珍贵的艺术品。

日本茶道兴盛之时，在失去“唐物茶入”来源



图一三 日本传世“唐物茶入”的包装

(引自根津美术馆:《唐物茶入》)

的同时,日本濑户陶业成功地仿烧了福建生产的薄胎酱釉小罐,但“唐物茶入”的身价却越发珍贵起来,15、16 世纪的日本贵族、大名、武士、茶人们纷纷为之陶醉、甚至献身,散发着不可思议的魅力而



图一四 日本藤田美术馆:古濑户文琳茶入“霜夜”(左),
日本根津美术馆:古濑户大海茶入“敷岛”(右)

(引自《茶入》,《茶道聚锦》第十卷《茶の道具》(一),
花入·茶入·茶壺,株式会社小学馆 1986 年版)

闻名于世(图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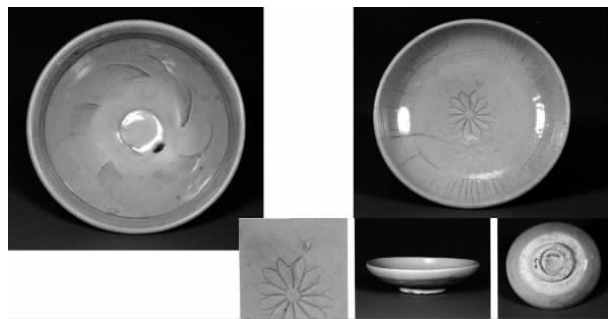
古建盏、新烧的浅腹黑釉小盏和“黑褐釉小瓶”共处一船而同时沉没于新安海底,与沉船中大批的龙泉青瓷、景德镇白瓷相比,虽然它们在数量上占着很小的份额,但却与镰仓时期日本贵族文献《金泽文库古文书》相互印证,“茶碗的输入及

饮茶之风愈来愈盛”!

日本著名学者山上次男先生曾经质疑在新安沉没的元代中国船上,为什么有的青瓷、白瓷品种从来没有在日本发现过,而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出土很多,特别是菲律宾,几乎向全世界的博物馆、收藏家们提供附龙形把手的白瓷葫芦形小水注和童子骑牛铁斑纹水滴。有可能新安沉船上的部分商品还要运往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历史上日本长期将从菲律宾进口的中国储茶罐当作“吕宋罐”,后来还将福建漳州窑产的素三彩盒当作来自越南的“交趾香合”,说明沉船上的少部分中国贸易瓷也有可能是在日本港口做转口贸易的。

新安沉船上出现的福建陶瓷茶具与日本的传世品、遗址出土遗物以及文献资料吻合,是日本饮茶风气开启时期,日本商人、寺院有意识进口的福建陶瓷。1994 年,福建省博物馆与日本裏千家茶道资料馆在京都联合举办《“唐物天目”——中国建窑出土天目与日本传世天目》展览会,大茶人千利休的后人、日本裏千家茶道的“家元”千宗室先生在开幕式上肯定“天目瓷”是于“草庵茶”诞生之前,在日本茶道形成过程中,曾给予了重大影响的陶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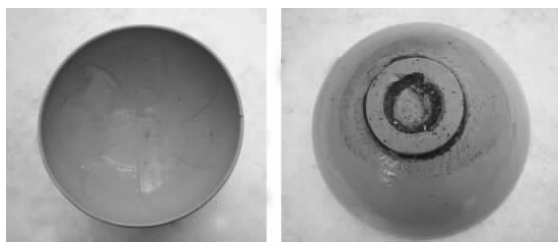
福建学者还在新安沉船出水图录里发现了以前不为人知的福建闽清义窑的白瓷碗、白瓷阳印刻划牡丹纹碟、阴印刻菊花纹碟、宽口径碟等,它们的装饰风格看似简约、草率,却令人感觉别具一格(图一五)。这些白瓷在日本的古遗址里屡见不鲜,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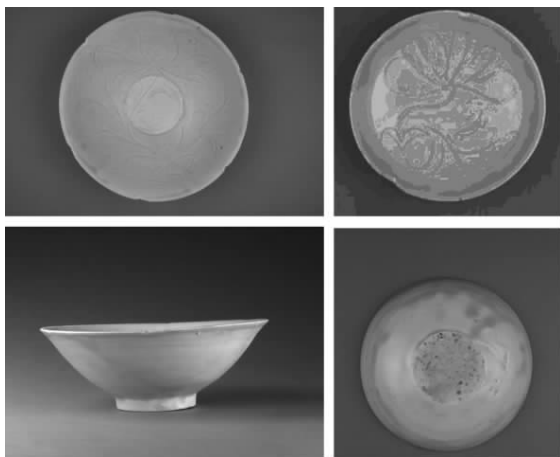
图一五 新安沉船出水的闽清义窑白瓷

(引自《新安船 白瓷篇》)

存在于 12~15 世纪日本的港口、城市的民居地,以碗、碟为主。福建连江的几个宋元沉船遗址点也多有发现与新安沉船出水相似的白瓷(图一六),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南宋沉船里的白瓷多数也是闽清义窑产品,器形有碗、盘、瓶、执壶等(图一七);广东“南海一号”南宋沉船也出水闽清义窑、青窑的



图一六 福建连江东络岛沉船采集的闽清义窑白瓷碗



图一七 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南宋沉船出水的
闽清义窑白瓷碗(左)、碟(右)



图一八 “南海一号”南宋沉船调查采集的闽清义窑白瓷

青白瓷,器形有碗、盏、执壶;同样的瓷器在东南亚各国也多有发现(图一八)。笔者不久前曾经前往闽清的几处古窑址探索遗物,密集的灌木林、茅草丛生的山头坡面,分散在连绵丘陵上的闽清窑炉群不经指点是看不出来的。目睹在峰岭、山涧间穿插的公路拦腰切断宋元时期的多处窑炉,沿坡散布的匣钵支离破碎,处处看到盗挖分子的铁锄留下的狼藉,残存在树根、草丛、泥土下八百多年的白瓷经过

人间的洗劫更加破碎!(图一九)经同往的学者指点,细看义窑宋、元白瓷在器形、胎体上的区别,庆幸还能发现有与外销瓷同类的瓷片,特别是发现了碗、碟底内的图案更是喜不自禁。作为民间自发的闽清窑



图一九 闽清义窑的一处窑址堆积场

尽管是从南宋至元末明初就在方圆几十里的十五个山头筑窑烧瓷,是福建烧造青白瓷的重要窑场,又是大批外销瓷东亚、东南亚的产地,却不曾在地方史书上被书一笔,如今通过国际文化的交流和发现海外遗址、海底沉船、窑址遗物都将成为闽清窑借着闽江水道外销东亚、东南亚的重要历史见证。

在福州城市的宋元遗址中,与薄胎酱釉器共存出土的有建盏、仿建盏,景德镇窑的青白瓷与龙泉窑青瓷,福建产的青瓷、青白瓷。福建沿海的南北航道上,已经发现沉船遗址的有:连江宋代“白礁一号”沉船、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泉州后渚港宋代沉船,出水有福建闽北、闽中、闽南、龙泉窑、景德镇窑的陶瓷器,东南亚香料、药材和荔枝。在向东南亚方向的航道上,西沙群岛宋代“华光礁一号”沉船出水有南安罗东窑、松溪回场窑、晋江磁灶窑的青瓷,少数景德镇湖田窑和一部分德化窑的青白瓷,多数闽清义窑的白瓷,磁灶窑独特的罐、军持、黑釉小口瓶等。广东“南海一号”宋代沉船出水景德镇窑、德化窑与闽清义窑和青窑的青白瓷、白瓷,龙泉窑青瓷,磁灶窑的酱褐釉、绿釉器等。同类的陶瓷器都为数不少地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国家,它们显示了福建在宋元时期生产的陶瓷器品种齐全、数量之大,在海外作为东方舶来的消费品是深受喜爱、广为消费的,它们是福建人为了讨生活而不惧风险投身外销的见证,同时也提高、美化着异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传播、弘扬着中国人化俗为雅的灿烂文化。

日本熊本大学考古研究室与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已经合作三年,研究项目包括对琉球群岛出土的13~14世纪闽江流域窑口陶瓷器的研究,近

(下转第109页)

受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所主导,直接的说,港口开放是导致这些窑场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注释:

冯先铭:《中国陶瓷文献集释》引明《安平志》卷四,物类志,手抄本,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0年。

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

(明)张燮:《东西洋考》小引。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

黄鸣奋:《厦门海防文化》,鹭江出版社,1996年。

叶文程:《福建地区青花瓷的生产与外销》,《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三辑。

《明熹宗实录》。

冯先铭:《中国陶瓷文献集释》(引清光绪十二年郭柏苍《闽产录异》卷一,货属),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0年。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精华大全》图830,商务印书馆,1993年。

⑪、⑫ 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⑬ 林恭务、郑辉:《平和田坑窑及出土素三彩瓷器的初步研究》,《交趾香盒——福建省出土遗物与日本的传世品》,日本茶道资料馆,1998年。

⑭ 栗建安:《德化明代窑址的发现与发掘》,《2002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⑮ 韩松:《泉州市寺庙宫观楹联选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⑯ 《旧唐书》卷二十四。

⑰ (明)张自烈:《正字通》。

⑱ (宋)高承:《事物纪原》。

⑲ 傅宋良、孙艺灵:《论德化青花瓷的产生与发展》,《福建文博·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6年年会专辑》。

⑳ (明)嘉靖《安溪县志》。

㉑ 叶清琳:《略述安溪纪年墓和带款识几件外销瓷器》,《福建文博》1993年第1、2期合刊。

㉒ 栗建安:《从考古发现看福建古代青花瓷的生产与流通》,《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三辑。

(上接第117页)

期出版的研究报告《13~14世纪的琉球与福建》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与成果。已发现的元代新安沉船与福建沿海南、北航道的宋元时期沉船,结合福建、东亚、东南亚古遗址的考古资料,证明福建在宋元陶瓷外销历史上因为那条横贯福建北、中部的闽江,水运便利,闽江口交通南、北方向,福州港作为闽江的下游城市,是各地商品的集散地与消费地。此外,福建泉州港早在唐代就沟通东西方贸易,同时又是几朝中央政府管理海外贸易的行政机构——市舶司的所在地,更加促使善于造船、航海、经商的众多福建人跻身制瓷行业,福建元代生产的外销陶瓷品种的存在,使得人们重新认识福建陶瓷漂洋过海的实力,能够在“海上陶瓷之路”上与龙泉窑、景德镇窑的陶瓷外销平分春色,为后起更甚的明、清直至今日的对外贸易奠定了雄厚基础。

发现七百年来无人知晓的新安沉船,好比在黑暗中开启了时间隧道。今日海洋考古的发现,发掘海底沉船留下的诸多秘密,传达陆地遗址无法提供的更多信息,各国新生的水下考古力量探索制造沉船灾难又保存文化遗产的海洋,再现先人们征服大海的同时又付出沉重代价的史实。

本文由福建博物院栗建安研究员配图

参考资料:

韩国文化公报部、文化财管理局:《新安海底遗物——综合篇》1988年。

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部、文化财厅:《The Shinan Wreck》2006年。

福建省博物馆、茶道资料馆:《唐物天目——福建建窑出土天目 日本传世の天目》,1994年。

赵嘉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古代外销瓷——中国水下考古工作与发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栗建安:《南平茶洋窑出土的黑釉茶碗》,《福建文博》1997年第1期。

栗建安:《福州地区薄胎酱釉器的初步研究》,台湾鸿禧美术馆:《陈昌蔚纪念论文集 陶瓷第二辑》,2003年。

王慕民、张伟、何灿浩:《宁波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史》,海洋出版社,2006年。

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

森达也:《日本出土的龙泉窑青瓷》,《故宫文物》,No.311 2009年。

谷晃:《日本对中国制茶罐的分类与受容》,《福建文博》2001年第2期。

⑪ 韩国留学生宋永恩翻译有关新安沉船出水木牌的韩文资料。